

理性的批判与存在的美学： 福柯与法兰克福学派

范萍萍

摘要：就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理性”的批判而言，福柯与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持有一致的立场。但由于各自方法论的差异，又使他们的理论显现截然不同的关注视野。通过对这二者的比较分析，使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收获他们各自理论的解释效力和文化价值。

关键词：福柯；法兰克福学派；现代理性

作者简介：范萍萍，1977年生，女，助教。（浙江传媒学院 电视艺术系，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06)04-0021-02

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专家理查德·沃林认为：在与法国后结构主义有所瓜葛的思想家当中，迈克尔·福柯的文化批评最接近于法兰克福学派所关注的论题，他的“系谱学”计划同批判理论家们的“工具理性批判”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似性。^[1]福柯自己也承认，他对纪律严明的、如监狱般被规约和管理的现代社会的分析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等人对“被控制的世界”的分析之间有着显著的类似。^[2]通过对二者理论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福柯与法兰克福学派都能够被置于批判理论的传统之下而分享一系列见解上的一致性，然而由于各自方法论的差异，又使他们的理论拥有截然不同的关注视野和最终归宿。

福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出发点都是对现代理性的控制力量的反思、批判和揭露，以及在现代的语境之下对历史当下性的内容和性质做出质问和诘难。他们都着眼于对现实世界的具体分析和综合解释，而不是像传统形而上学哲学那样，把扮作“自在之物”的精神和抽象的自然本质从人的异化的现实性中抽离出来。不同的是，法兰克福学派讨论的是现代人在实现对自然的征服的同时又被自然所物化，并同时造成的社会心理的压抑，现代社会在工具理性的强化之下如何实现了对大众的统一化管理和总体性控制，它主要着眼于对现存秩序之下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批判；而福柯则集中关注的是个人如何在社会规约、话语实践的权力机制和结构中被控制、规训和塑造造成社会主体，他投眼于现代社会的缝隙和边缘地带，用“考古学方法”和“谱系学方法”向我们展示了知识、话语的权力性质及其运作策略，出色地揭露了权力的“微观物理学”。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首先是发展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并把物化过程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生继续向前追溯到人类文明的源头，也就是对启蒙理性的批判中去。在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就集中阐述了这种观点：启蒙的目的是“使世界清醒”，让人们从虚幻的思维和对神秘的恐惧中解放出来，成为主人。因此，启蒙试图“取消神话，以知识

来代替想象”，但正是在对“知识就是力量”的过分度信中，作为启蒙的理性，特别是在它抽象为综合化、实质化和工具化的理性时，它就又走向了自身的对立面，使人类被它所控制和束缚。启蒙理性实现了人对自然的全面控制，但同时也导致了对人的内在自然的控制。比如《荷马史诗》中的《奥德塞》就反映了这种启蒙精神的源起。奥得修斯为了实现统治的目的，就必须不断地牺牲和克制自己内在自然的要求。为了抵制塞壬的歌声——这代表自然力量的诱惑，奥得修斯让其他人用蜡封住了耳朵，而把自己捆绑在了桅杆上。这样以来就坚定地控制住了自我的存在，避开了因歌声而迷失的危险。奥得修斯因此而抵制了自然的诱惑力，同时其肉体的控制和束缚，使完整的幸福破碎，只能存在于渴求之中。这就导致了人在对自然界实现控制的同时，也实现了对人类自身的控制，并最终实现了对社会界的控制。^[3]

与法兰克福学派一样，福柯也深入批判了启蒙理性所招致的知识对人类的控制力量，但二者不同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是在较为抽象的意义上将知识与人的内在自然对立起来，而福柯则是通过话语/权力的运作机制更为深入地揭示了理性的压迫力量是如何通过复杂微妙的权力网络的共同作用而得以发生的。福柯应用考古学和谱系学的研究方法，将话语置于具体的社会制度和实践之下，从而揭示出其中的权力机制。他深信尼采的论断，即“求真的意志是与权力意志分不开的”，认为任何时期的知识形构同时就是权力机制，知识是作为权力的武器而发生作用的。福柯在他的访谈录里谈到：“哲学家，甚至是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离开来，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4]而福柯为自己确立的目标，却是用哲学来限制知识的领域，他认为，当社会和人类行为成为科学研究对象的时候，科学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处于权力机制之下的社会和人的问题，因而“人文科学是伴

“随着权力的机制一道产生的”，它的发展也会进一步完善权力实施的技术和策略，从而强化和改进社会规训和控制的手段。比如说“精神病学”一开始就是从监禁精神病人、规训大众从而维持社会秩序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而它的研究结果又是进一步强化和改进了它实施权力功能的技术和手段。因此，“既不存在抛开一个知识领域的相互关联的构造的权力关系，也不存在任何不预想和构造各种权力关系的知识。”这就对现代理性的解放功能提出了质疑和批判。福柯还揭示了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是如何在他称之为口头或书面表达的组织形式和概念框架——即话语中活动的。福柯认为，话语就是在服务于某种类型的权力关系的背景中组织知识的特定方式，这个概念框架允许某些思想模式而排斥其他思想的可能性。话语间的消长起落、斗争倾轧都是由于权力机制的作用。权力机制操纵了知识系统和话语实践来控制 and 规范各种人类行为，例如疯癫就被作为“理性”的话语实践的对立面而遭到迫害和压制。

知识—权力的庞大网络就是要将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整合到现代的话语实践之中去，从而产生现代的“规训社会”，社会控制得到全面的实现。这就与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虚假的同一性”和“总体化的社会”有着深刻的一致性。

《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工业理论，这一理论分析了启蒙理性所倡导的文化的同一状态怎样导致了社会对大众的总体的控制；福柯也揭示了在知识系统和话语实践的整合之下，个体是如何被规训和塑造成温驯有用的社会主体的。但由于福柯的权力观更为弥散和微观，它浸透到了现代社会的各个角落和缝隙之中，因此又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机制的权力控制有着根本的差异。法兰克福学派在对文化产业进行严辞批判的同时，提倡自律的现代派艺术，这种艺术寄予了他们审美乌托邦的理想，也就是理性与自然的一而非对抗的状态，那么自律艺术的使命就是要表现出对异化现实的决裂，他们坚持内在超越性的艺术观念，他认为自律的艺术以其自身的理想的和谐状态能够实现对社会的批判，并构成与文化工业的对抗，这样文学本身就具有了超越异化的颠覆能力，“具有从所有决定性中解放出来的能力”，写作成为某种具有革命性质的行为；而这些恰恰是福柯所反对的，因为他认为话语实践总是与权力网络并行产生的，因此不存在一种不受权力影响的话语，也不可能用这样一种话语来推行批判。在他看来文学的革命性和颠覆性只能是一种虚妄，它也不可能指向一个最终的审美乌托邦的理想，在他看来任何人文现象都没有一个固定发展的轨迹，也没有任何终极意义的目标可以企及。文学本文不可能承载超越权力机制的“真理”，话语/权力不仅无处不在，而且还是一种永恒的战略，因此福柯倡导一种文学的不及物性，并藉此来“摆脱文学是所有思想交流的终点和汇聚地这样一种观念”，使文学成为没_了所指意指，他强调文学作品中作者的死亡、沉默和消隐（他代表着文学作品中的权力原则），以此来取消文学话语的规范性，取消文学的神圣性的话语功能，弱化某种特定的话语类型的权力的发挥。因为任何一种类型的话语结构当它被规范化和神圣化的时候，就必然陷入权力的合法性之中。所以福柯更加关注的是非文学的话语怎

样通过一系列的运动和过程进入到文学领域的，割断任何文学的绝对性的表达，揭示规范的话语实践和非规范的话语实践之间的对峙和渗透。

由于阿多诺等人对文化产业的坚决排斥，导致了他们的精英主义立场，并在文化领域形成了高雅/通俗，精英/大众的二元对立，对后者持蔑视态度。可是按照福柯的观点，高雅/低俗的二元对立就恰恰体现了一种话语权力的实施，并且试图把前者置于权力的合法化之中，而这又是福柯所反对的。因此我们可以发现福柯对大众文化所持有的更为平民的姿态和更为宽容的态度，例如在被问到对摇滚乐的看法时，福柯谈到“我们无法谈论当代文化与音乐的普遍的单一关系，而是应该更加宽容，对音乐的多重性采取一种多多少少是亲善的态度。每一类音乐都有权力生存，这种权力可以视为价值的平等。每一类音乐的价值都取决于实践并喜爱它的人的认可。”而且法兰克福学派在分析文化产业造成的社会对大众意识形态的控制的时候，视大众为完全被动的客体，忽视了他们对文化做出积极主动反应的可能性，因而对文化现状持一种悲观的态度。这一点又与福柯的看法相悖，虽然福柯认为权力无所不在，个体永远也无法摆脱权力的构成和规训，但是个体并非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在权力的组织过程中，个体存在着被塑造和积极抗争的双重可能，福柯指出：“我要说：一旦存在权力关系，那么就会有抗争的可能。我们决不能被权力诱人圈套：我们总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按照某种精确的战略改变它的控制。”^[5]福柯在社会权力的微观层面（比如监狱、医院、收容所里）揭示了各种非规范的抵制和抗争正在不断瓦解宏观的权力规范机制，正是这种控制与反抗的张力关系的存在，使福柯表现出了与法兰克福学派截然不同的乐观态度。

福柯不认同任何普遍的真理，也否认任何可以与权力相分离的知识系统和话语实践（比如文学话语和哲学话语），但同时又能对个体形成风格化的自我持乐观的态度，这表现于他所提倡的“一种存在的美学”，摆脱掉某种超验性原则或真理原则的指使，拒绝在理性的内部作出同它自身有关的阐释、界定，而是高扬“理性的他者”作为理性的反题来对它加以不断的破坏和瓦解，以边缘来抵制一切规范化的中心指向，作出一种不倦的可能性的探究，在现实中去审查“真理的游戏”，悬置和质疑任何先在的理性的价值。

参考文献：

- [1] 理查德·沃林. 文化批评的观念 [M]. 张国清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170.
- [2] 马丁·杰·阿多诺 [M]. 瞿铁鹏、张赛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22.
- [3] 阿多诺、霍克海默. 启蒙辩证法 [M]. 张峰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1
- [4] 福柯. 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 [C]. 严锋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31.
- [5] 福柯. 性经验史 [M]. 余碧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2.